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沂蒙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时代价值

□ 包心鉴



“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内涵的沂蒙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熔铸淬炼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年代，发扬光大于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沂蒙精神既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既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革命精神，又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时代精神。

今天，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沂蒙精神依然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和强烈的感召力量。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深入挖掘和研究沂蒙精神的鲜明特质和核心要义，深刻彰显和延续沂蒙精神活的灵魂和精髓真谛，对于科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赋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绕沂蒙精神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特质，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深入理解和把握沂蒙精神的核心要义及其时代价值。

听党指挥、坚信不移、紧跟党走、坚定不移，是沂蒙精神的“灵魂”。这一特有的精神形态，是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坚固的精神支撑

沂蒙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孕育形成的，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与淬炼中不断完善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和为了人民解放与幸福顽强奋斗、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与沂蒙地区固有的淳朴善良、深明大义、追求光明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有机融合，从而逐步培育成“听党指挥、坚信不移、紧跟党走、坚定不移”的崇高精神境界和优秀精神品质。这不啻是沂蒙精神的“灵魂”。

这一精神之“魂”，渗透于一代又一代沂蒙儿女的精神境界，贯通于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经久不衰、历久弥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一声令下，五十万沂蒙父老乡亲奔赴前线，披星戴月奋勇向前，千辛万苦为党分忧，用小车推出了革命胜利，用小车推出了新中国诞生。有多少沂蒙儿女，为了党的号召和革命的胜利，抛家别业、牺牲自我，千磨万难、毫无怨言，中

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与沂蒙人民的自觉行动，在那个历尽艰险而又充满激情的年代实现了完美的统一。正是这样一种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集中表现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集中表现为“大胆开拓、改革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集中表现为“锐意进取、奋勇向前”，成为沂蒙精神紧随时代步伐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成为沂蒙地区乃至山东全省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精神主旋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最根本保证。党的奋斗目标的逐步实现、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推进，根本基础在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根本动力在于人民对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的高度认同和自觉参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特质和发展方向的本质规定。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机地统一起来，是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加强党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结合，一要求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把人民的主体精神和创造活力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把准人民脉搏、回应人民关切、体现人民愿望，增进人民福祉，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力量。

牺牲自我、顾全大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沂蒙精神的“内核”。这一特有的精神形态，是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倍加珍惜的精神动力

在充满艰险与牺牲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自我牺牲精神的熏陶，血与火的考验与淬炼，铸造了沂蒙精神牺牲自我、顾全大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块布，拿来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他上

战场”，生动诠释了沂蒙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用乳汁抢救受伤小战士的红嫂，把青春奉献在支前第一线的“沂蒙六姐妹”，鲜活展示了沂蒙人民的自我牺牲的宝贵品格；用全部心血抚养革命后代、革命胜利后却毫无所求的沂蒙母亲，深刻彰显了沂蒙人民比天高、比地厚的博大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沂蒙精神之所以感动天地、之所以源远流长、之所以与时俱进，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其全部奥秘正是在于形成了这样一种牺牲自我、顾全大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这一精神“内核”，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代代传承，溶化为沂蒙精神所特有的精神特质，转化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尤其需要进一步弘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牺牲自我、顾全大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一沂蒙精神的“内核”，生动诠释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依靠和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创造了近一亿人口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伟大奇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加伟大、更加艰巨的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尤其需要进一步把握历史主动精神，坚定信心、锐意进取、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埋头苦干、奋勇前进。正是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沂蒙精神的“内核”不断释放出耀眼的时代光芒。

以人为本、人民至上、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沂蒙精神的“精髓”。这一特有的精神形态，是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不断激活的精神源泉

沂蒙精神从本质上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共同缔造的精神，在沂蒙精神中处处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以人为本、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内涵。革命战争年代，党组织深深扎根于沂蒙大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人民同

甘苦、共患难，为夺取革命胜利、实现人民解放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无数优秀共产党员的热血抛洒在蒙山沂水上，无数革命烈士的忠魂长眠在沂蒙大地中。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高度忠诚和为人民不懈奋斗的崇高精神，赢得了沂蒙人民的衷心爱戴和自觉认同，转化为真心实意听党指挥、坚定不移跟党走前行的自觉行动。这样一种党群血肉相连、军民水乳交融的光荣传统，世世代代传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继续发扬光大，成为沂蒙人民艰苦奋斗、改造山河、锐意改革、不断创新的坚固精神支柱，成为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这样一种党群血肉相连、军民水乳交融的沂蒙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无疑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时代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深刻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人民群众，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如何密切党群关系，确保党始终不脱离人民，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党的建设最核心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奋力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伟大工程引领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始终聚焦的核心问题就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如何通过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的力量确保党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永远成为人民的领路人和“主心骨”，时刻防止和清除权力腐败现象，坚决反对和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不啻是我们这个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的最大难题。坚守以人为本、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沂蒙精神的这一“精髓”和党群同心的优良传统，为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如何应对严峻考验、化解独有难题、永葆青春活力提供了具有永久启迪意义的宝贵答案。

（作者系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特邀研究员，山东省社科联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明体达用 体用贯通

□ 张 恒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所蕴含的体用论范式，是历史上儒释道交流互鉴的智慧结晶，代表了汉语哲学最为精深的理论思考。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传统体用论的继承和发展，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思路，为创造新时代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

文明互鉴的智慧结晶

“明体达用”始见于元朝张光祖编撰的《言行龟鉴》，用来概括宋初理学“三先生”之一胡瑗的教学之方。胡瑗不满隋唐以降偏重文辞、轻忽经业、苟趋利禄的风气，“其教学者必以明体达用为本”。“体”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用”指“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明体达用”意为明通永恒的价值准则并推而广之、经世济民。这一理念在胡瑗首创的分斋教学法中得到具体贯彻，他立“经义斋”讲明“六经”，又立“治事斋”教授治民、治兵、水利等民生之学。“体用贯通”是“明体达用”内蕴的理念，指体、用之间由体达用、由用显体的内在统一的关系。类似表述在唐宋时期大量出现，如“体用玄通”（法藏），“体用一源”（程颢）等。

“体用论”思维源远流长。明末清初，曾有学者就体用论的起源发生过争论：李颙认为体用二字相连并称始于佛学，即惠能《坛经》，顾炎武则认为体用并举始于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并认为惠能和朱熹的体用之论皆源于此。就形式而言，体、用对举的表述确实古已有之，战国荀子言“万

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荀子·富国》），西汉司马谈论道家宗旨时说“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史记·太史公自序》），东汉魏伯阳曾言“春夏据内体，秋冬当外用”（《周易参同契》），这些关于体用的言说都远早于佛学。而就内涵而言，从先秦至魏晋，中国本土的体用言说总体上处于经验层面；佛学入华之后，才逐渐赋予体用论以思辨形态。汤用彤曾指出，东晋僧肇“即体即用”之旨达到了体用言说的最高峰。由此，体用论虽不是自佛学而始，却因佛学而获得了新的形态，开启了新的发展。宋代以后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思想，离不开佛学在中国化进程中所作的贡献，是儒、道等中华古文明与佛教文明交流互鉴的智慧结晶。

汉语哲学的精深思考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蕴含的哲学智慧，不仅是中国古代体用论发展历程中的成熟形态，也代表了汉语哲学最为精深的理论思考，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直接力证，对黑格尔等人关于中国无哲学等观点形成反证。

古典体用论有两个典型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有两种典型形态：形体体用论与性体体用论，或称形质论体用论与本体论体用论。先秦汉魏时期的体用论主要是形体体用论或形质论体用论。唐代崔憬曾对这种体用论的特点作精准概括：“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体”是事物的形质、形体，“用”是其属性、功能等。比如，扇子是体，扇扇子所带来的清风和凉爽便是其用。这种体用论主要是在经验层面对现象世界的描述和解释。佛学入华促使隋唐时期发展出新的体用论形态。佛学的“体相用”结构，不再从形质、形体意义上理解“体”，而是从本性、本质意义上理解。“体”是现象及其属性、功能背后的本质。“体”是“性体”。这种性体体用论或本体论体用论不再是经验性的描述和解释，而是超越于经验的思辨的构造，如佛学就将“缘起性空”作为世界的本质。宋代理学对之前

的体用论作了双重反思与扬弃，发展出既思辨又实在的体用论。程朱学派是新型体用论的集大成者。程颐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易程氏传》）具有超越性的普遍法则“天理”是“体”，天地万物丰富多彩的“现象”是“用”。经过儒佛互动而在宋代重新建构的体用论，已然具备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点。

黑格尔曾认为中国“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王国”，德里达也曾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哲学。实际上，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体用论正是汉语哲学思辨性的集中体现，是对黑格尔、德里达最为直接、有力的反驳。

近代救亡图强的重要理论范式

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面临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以及坚持何种文化主体性等重要课题。从19世纪中叶开始，各派以体用论为主要理论范式，提出“中体西用”“中体中用”“西体西用”等不同的文化观。其中尤以较早提出的“中体西用”说影响最为广泛。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这一文化观的萌芽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的主张，较早表达了“西用”观点。后来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中体西用”思想已见雏形。张之洞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劝学篇》）思想，旧学指“四书五经”等中学，新学则指西政、西艺、西史等西学。这一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广泛流行。

作为体用论在文化观上的应用，“中体西用”说近代获得较多认可，影响广泛，但也面临理论和现实上的问题。严复就曾批评“中体西用”论割裂了体和用，“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体和用是就一物而言，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

“两创”漫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综观我国上下五千多年延绵不断的文明发展历史，一脉相袭的礼制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深层根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山东地区

的考古发现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有着数千年礼制传统，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在国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演进，礼不断成熟完善，其内涵也不断延伸和丰富，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成为涵盖国家、社会 and 个人的文明秩序体系。中华礼制文明源远流长。礼伴随着中国文明的起源而出现，萌芽于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考古发掘证明，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开始相继进入初期文明阶段，礼也开始孕育萌生。龙山时期，随着从村落、聚落到礼制化的邦国、邦国联合体等政治实体的演进，原始礼仪也越来越复杂而逐渐政治化、制度化，在一些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的邦国内礼制已经形成。二里头文化时期，礼制度更加完备，作为一种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礼制自此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自周公制礼作乐，中国步入礼乐文明新阶段，逐渐形成一套系统完备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随着时代发展，“礼”的形式和内容虽有变化，但其内在的精神则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积淀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区域，史前文化自成谱系，赓续有序，其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演进轨迹清晰，在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礼制，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山东地区史前礼制形成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主要体现在丧葬制度、祭祀制度、礼器制度等方面。

丧葬制度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后代礼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其墓葬规模、棺椁葬具的形制、随葬品优劣多寡等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化、规范化特征。在泰安大汶口、邹城野店、章丘焦家、滕州岗上等遗址的墓葬中均可见木质棺槨。焦家遗址的大墓用重槨一棺或一槨一棺，中型墓多为木棺，小墓多无葬具，至龙山时代，棺槨的使用更为普遍。无论是在日照两城镇、日照尧王城这样的大型聚落，还是在临胸西朱村、泗水尹家城等中小型聚落，其大中型墓中均可见木质棺槨，随葬品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等级分化严重，墓葬与社会分层紧密结合，也反映出丧葬礼仪的复杂化与初步制度化。

祭祀制度是礼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岱地区发现的大量史前祭祀遗址，反映出早期社会祭祀制度的形成。章丘焦家遗址有20多座祭祀坑，都集中分布在大型墓葬区域附近，部分祭祀坑内祭品分层堆积。到了龙山时期，祭祀现象更为多样，祭祀内涵更为丰富。景阳冈城、田旺城址等史前遗址中都发现有大型祭祀区。部族贵族通过祭祀活动掌握民族公共权力，为王权渲染神权色彩，进而强化王权，并在聚落内部形成一整套的祭祀制度。

礼器是礼制的物化载体，古人云“器以藏礼”“器以载礼”。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礼器以制作精良的高规格陶器和玉器为主，陶器主要包括鼎、鬲、甗、盂、高足杯等食器酒器，形制多样，以黑陶和白陶最具特色。玉器主要是玉钺、多孔玉刀、牙璧、玉冠饰等。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情况看，食器、酒器、乐器等组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宴饮组合，与成组玉器一并构成较为完备的礼器制度。这种基本稳定和普遍的组合，充分说明当时礼器使用的初步形成和制度的化，对中华早期礼器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私有制的发展，在大汶口时代中晚期的山东地区，贫富差距出现，聚落开始分化，社会开始分层，在少数大型中心聚落中开始出现高等级大墓，已出现用棺槨、用殉牲及礼器等现象，礼制开始逐渐萌生。直到龙山时代，社会生产力、私有制进一步发展，贫富分化更加严重，社会等级更为严格，社会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一些都邑性聚落遗址出现了大型高台宫殿建筑、大型祭祀区、高等级贵族大墓。同时，诸多大中型聚落的丧葬、祭祀活动形成规制并不断完善，且出现了较稳定的礼器组合和较严格的使用制度。这些现象充分说明山东地区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复杂化程度逐渐加深，礼制逐渐形成。在史前晚期，东方的礼制不断由黄河下游汇聚到中原地区，并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周时期丧葬礼制中的棺槨制度，主要是吸纳了山东地区早期棺槨制度的传统。三代时期对天地祖先的祭祀以及礼乐器用制度，与史前山东地区的礼制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反映出山东地区史前礼制是三代礼制内涵极为重要的源头，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贡献。

礼制构筑起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深层根基。《论语·为政》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夏商周三代的礼制经过发展演进，至西周达到了较高的礼制水平。此后的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朝代有更迭，但礼制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礼制制度具有更高延续性。礼制文化蕴含下定的性、同源共祖等历史认同观念，推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文明得以一脉相承、连续不断。“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遭遇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礼制传统正是构成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重要内在动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赓续历史文脉，就要在正确认识礼制文明的基础上，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作者单位：济南社科院历史文化研究所）